

耶胡达·阿米亥：

我的诗歌真真正正是犹太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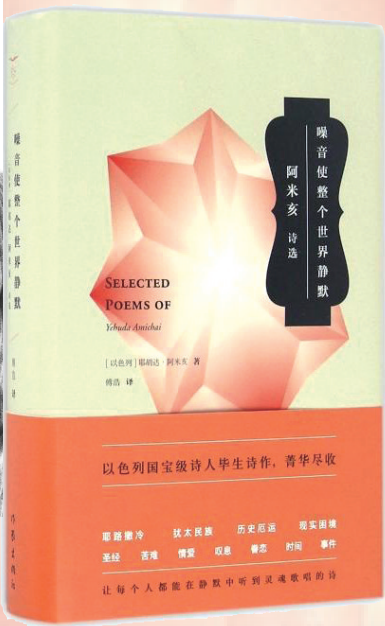
□钟志清



如果说奥兹是中国读者最为喜爱的希伯来语作家,那么耶胡达·阿米亥则应该是中国读者最为喜爱的希伯来语诗人。

阿米亥1924年出生在德国一个正统派犹太家庭,自幼接受犹太传统教育,在德语与希伯来语的双语环境中成长。1936年随家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先住在佩塔提克瓦,而后搬到耶路撒冷。当时以色列尚未建国,耶路撒冷仍旧为英国人管辖。与众多同龄人一样,阿米亥在青少年时代也受到了希伯来民族主义思想的浸染,但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他必须用德语代替希伯来语,并且时刻准备参军,为即将建立的以色列国家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米亥加入了英军的犹太纵队,并参加过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阿米亥自50年代登上文坛后,用希伯来语相继发表了《现在和别的日子》《两个希望之遥》《在公共花园》《并非为了记忆》《你本是人,仍要归于人》《就连拳头也曾经是五指伸开的手掌》等15部诗集,还发表有《并非此时,并非此地》等两部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戏剧与儿童文学作品。此外,阿米亥还有许多译作面世,如在英语世界影响颇大的《耶路撒冷和我自己之歌》《阿门》等,收入其中的作品有的出自诗人自己之手,有些乃是诗人与其他译者、诗人如泰德·休斯等合作为之。

阿米亥的诗歌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色列新诗创作的雄辩代表,同以色列的历史和政治进程具有鲜明的一致感。他常



说,所有的诗歌都是政治性的。这是因为真正的诗表现的是人对现实的反应,而政治是现实的一部分,是正在形成的历史。即使诗人写的是坐在玻璃房子里品茶,这也反映政治。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无法摆脱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便是战争。几十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相继经历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1956年的“西奈战争”、1967年的“六日战争”、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等五次中东战争,经历了1987年和2000年的巴勒斯坦起义,还经历了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阿米亥虽然在2000年9月便已经作古,但早在1948以色列“独立战争”时期,他便在犹太人的帕尔玛赫先锋队中作战,从此,便未曾停止过对战争的关注。但是,他并没有从民族命运角度来赞美战争,歌颂战争;而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憎恶战争,反对战争,表示“对于战争我无话可说,没什么可补充。我感到羞耻”(《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他一方面借助诗歌寻找战争记忆:“我的好朋友,1948年6月,在阿什杜德沙漠中,死在我的怀抱和他的鲜血里。哦,我的红胸/朋友。”(《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一方面不住地剖析战争的无情,展现被战争损坏的个人,他在诗中写道:“一个男人——他儿子战死了——走在街上,就像一个子宫里怀着死胎的女人。”(《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

阿米亥生命中不可忽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其在德国便形成的与生俱来的流亡犹太人的体验。因此,在阅读阿米亥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不仅要关注他的以色列人身份,同时,也不能忽略童年时代的德国记忆对塑造阿米亥其人中的重要影响。

阿米亥诗歌和小说中时而出现一个女孩,名叫路得,那是他幼时的小伙伴,甚至被称作他“童年时代的恋人”。1963年,

路得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他曾去拜访旧日的母校,也去拜访了路得昔日的家。路得和阿米亥的许多小伙伴一样,没有逃离纳粹的魔爪,死于集中营,但却镌刻在诗人的记忆深处:“有时候我想起你,小路得,/我们在遥远的童年就被分开了,他们在集中营烧死了你。/假如你现在还活着,你会是个六十五岁的女人,/一个在年老边缘的女人。你二十岁时被烧死了;/自从我们分别后,我不知道你在短暂的生命里/都遇到了什么事。你获得了什么,他们在你/肩膀上、衣袖上、你勇敢的灵魂上都打上了/什么样的标记,他们给你别上了什么样的/闪光的星星,什么样的英勇的装饰、什么样的/爱的奖章挂在你的脖子上,什么样的安宁降临在你身上,愿你安息。”(《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

尽管阿米亥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也不是大屠杀幸存者,尽管他有时也表现出憎恶历史的一面,但在许多作品中,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犹如潜文本,通过诗人幼时的伙伴路得予以赋形,表达出以色列诗人对那段历史的追忆与追问。而在问世于1963年的长篇小说《并非此时,并非此地》中,阿米亥则通过主人公约珥回返德国的方式,与过去建构联系,以便弄清路得之死的真相,以及杀害路得的刽子手的现状。约珥这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阿米亥个人或那代人经历的投影,他们尽管在年轻时代便移民以色列,躲过了那场历史灾难,但有时不免为这种逃离而负疚。

耶胡达·阿米亥在一个正统派犹太家庭中长大,尽管成人后不再严格恪守宗教仪式,但是犹太宗教传统却早已渗透到他的灵魂与血脉之中。就像他自己在1997年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说:“我们所用的每个词,均取自《圣经》、祈祷书、解经学和《塔木德》,并拥有了其内涵。每个字都在犹太历史的大厅内回响,具有宗教背景的我所采取的口语仍然保持着原先传统中的神韵。我在诗歌中同时采取新旧两种标准。我在诗歌中试图重新创造并解释。这样看来,我的诗歌真真正正是犹太人的。”

在耶胡达·阿米亥的心目中,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辉煌与力量,人类沐浴在上帝赐予的神恩之中,沐浴在上帝施与爱的雨露中,人对上帝的情感交织着爱恋与敬畏,而上帝对人的感情则有着远近亲疏之分。令许多中国读者颇为熟悉的《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的第一节从第一个层面表现上帝对人的怜悯带有选择性,其怜悯程度与人类的纯化程度密切相关,因为之后幼儿园的孩子才有权利得到怜悯,学校的孩子所得的怜悯次之,而成人则得不到任何怜悯。幼儿园的孩子、学校学生与成

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幼儿园的孩子最为单纯无邪。但是,阿米亥也提到成年人若想得到救赎就要通过爱,因为上帝关注真正的恋人,“怜爱他们,庇护他们,像一棵树荫覆着睡在/公园长凳上的老人。也许我们也会给他们/母亲传给我们的/最后的稀有的同情之币,好让他们的幸福佑护我们,现在和别的日子。”(《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英国学者阿布拉姆森曾经提出一种有趣的推断与假设,称这首诗是对拉什释解《创世记》的一种模仿,拉什主要认为上帝首先怜悯众生,而后有所选择。进而暗示着人类始祖遭到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被逐出伊甸园。而“真正相爱”的人则能够得到上帝的庇护,不受外界的侵扰。这并非只在宗教层面上用爱来换取上帝的怜悯,而且具有人本意识,呼唤人与人之间的无私救助,在犹太传统中具有历时性。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犹太学根基的诗人,阿米亥对上帝的认知与阐释似乎没有超越古代犹太宗教经典对上帝的理解,但在诗歌实践中,他用现代希伯来语拉近了现代读者与文学传统的距离。他经常套用与模仿圣经诗歌与韵文,但每每加上现代人的思想,进而打破了原有的文本秩序与意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构了一座桥梁。

我在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傅浩是最早把阿米亥引入中国读者视野的译者。早在1993年2月,我刚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不久,便收到傅浩馈赠的阿米亥诗集《耶路撒冷之歌:耶胡达·阿米亥诗选》(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那是中以建交后中国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几部以色列文学作品之一,为此,傅浩还曾应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之邀前去以色列访问,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诗人阿米亥,并与阿米亥成了忘年交。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傅浩翻译的《耶胡达·阿米亥诗选》增订本,新增译诗64首。2016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阿米亥诗选》,依旧是傅浩翻译。全书在前两版阿米亥诗选的基础上,新增译诗327首,总共收录译诗573首。虽然没有囊括耶胡达·阿米亥的全部诗作,但已经是迄今国内最全的一部阿米亥诗选了。

傅浩对于翻译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与阐释,他强调在译诗过程中以准确为第一原则。在他看来,这不仅意味着意义的准确无误,而且意味着在此基础上句式、行式、语气、措辞、意象等形式和风格诸方面以及整体效果向原作的贴近。在翻译时,他除尽量保存原诗意象等有机形式外,尽量使用当代白话与散文句法,因为这是原诗语言风格在译文中最可感的体现。

## 《走向生命诗学——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

# 中西贯通与互鉴

□许 钧

改革开放近40年,随着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大量引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同时,研究的国际化倾向日益浓重。从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到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族裔批评、生态批评等,我们在研究理论、方法、问题、视野、立场上亦步亦趋紧随在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之后。虽然国际化是一种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正在消融民族和国家的边界,网络化、信息化、标准化助推了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趋同倾向,但是当前的国际化从根本上说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模式和意识形态的普及化,其显著后果是,它导致了世界非西方文化体系的萎缩。真正的国际化应该是立足于本民族立场之上,与国际其他文化的多元对话,在多种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创新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作了阶段性回顾和反思,肯定了学习和借鉴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必要性,特别强调要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来探讨和研究外国文学,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20多年来,我们一方面大力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思潮和新方法,一方面努力探索中西贯通视野下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既尊重外国文学本身的社会文化背景、思维特性和文论思潮,又坚持中国批评者独特的研究视野、方法和立场。但是,从总体看,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对西方文论和方法的模仿和借鉴太多了一点,而从中国文化和诗学出发去研究外国文学和文论的论著还需要更多一些、再多一些。近读高奋的《走向生命诗学——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追求中西贯通与互鉴,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该书的研究带着对本土现实的关怀。诚如葛兆光所言,“中国的外国文学,并没有触及自己现实的问题意识,也没有关系自己命运的讨论语境,总在本国学术界成不了焦点和主流”。很多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也借用了他们的问题,结果便成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远离本土性和现实性,缺乏创新性和影响力。高奋的研究对象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随笔、日记、书信等,要从这些零散模糊的审美感悟中提炼出伍尔夫对艺术本质、创作思维、作品形神、批评要旨和艺术境界的洞见。这一选题与基于审美感悟的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问题相合。该著以中国传统诗学范畴和欧美文学大师的诗性思想为参照,将伍尔夫飘忽不定的感悟聚合成有形的理论予以揭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诗学的博大精深。

其次,该著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中国传统诗学特有的整体观照法。这是我国自先秦以来就普遍采用的感知事物方法,强调运用直觉感悟,让主体的生命精神与万物的本真相契合,具有直觉感悟、整体观照、物我

契合等生命体验的特征,不同于西方重逻辑推论的理性认知方法。高奋的专著首先将伍尔夫的审美感悟放置于英、古希腊、俄、法、美、中、日等众多国别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实证考察其审美渊源,透视其独创性;然后从本质、构思、形神、批评和境界五个方面系统阐释其生命诗学内涵;最后以作品《海浪》为例,印证其理论在作品中的实践。这是一种颇具原创性的整体观照,融中与西、史与思、表象与本质、形式与神韵、创作与批评、物象与心境、审美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等诸多相辅相成的因素为一体,可洞见其审美思想之全景。

再者,该著的研究视野和评判标准是中西贯通的。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曾指出,西学研究的两主要方法是语言学模式和阐释学模式,前者聚焦并揭示内在语言构成,后者从社会、文化、政治等视角出发阐释意义;两者均将文艺视为理性认知之“物”,分别从内外两方面剖析它。而中学研究将文艺纳入天地、社会、心灵的整体中来考察,并力求贯通天道、政道、人道、文道等,从相互关系中感悟并揭示其本质意蕴。中西贯通便是基于西学的科学研究,辅以中学的整体观照,将“物”的研究和“心”的感悟融会起来,以贯通理性认知和审美感悟。老一辈学者钱钟书、朱光潜等早已确立了中西贯通的研究视野和评判标准,比如朱光潜对“诗的实质与形式”的探讨是从剖析克罗齐的理论出发,止于中国的意境说,透彻阐明两者的关系。高奋的研究实践并推进了这一中西贯通的视野和准则。她的研究始于伍氏思想的溯源追溯、意蕴分析及其西学价值揭示,止于相应的中国诗学范畴之观照,既揭示其深刻理性内涵又阐明其高远审美意蕴,所涉及的中国诗学范畴广泛,充分体现中西贯通之宽广与深厚。

最后一点,该著的研究立场与目标是走向生命诗学。西方文论对文艺本质的界定的不断变更(比如艺术即模仿、艺术即快感、艺术即表现、艺术即技巧、艺术即文化生产、艺术即后殖民等)催生了模仿论、表现论、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众多文论流派,它们常常各执一端,与文艺本身渐行渐远,须不断更新定位来保持与文艺的关联。中国传统诗学长期坚守“诗言志”这一文学本质属性,坚信艺术本于心,乃生命情志的抒发,由此阐发的诗学范畴以感悟的不断深入为特征。西学研究中学研究的区别在于,前者围绕“人的生命”这一核心,从世界、作者、读者、文本、社会、文化、政治、性别、族裔等多个视角去考察和阐释它,阐发了很多片面而深刻的理论,言繁而意简;后者锁定“人的生命”这一核心,用生命体验去直觉感悟艺术的内质和外延,言简而意深。高奋的研究聚焦文艺的生命本质,以博大精深的中国诗学范畴观照西方文学家伍尔夫的深切艺术感悟,试图全景揭示其生命诗学的渊源、内涵和价值,展现中西艺术和诗学的相通性,对我们重新认识中西文论和文学有很好的启示。

## ■动 态

## 第十届澳大利亚文学周开幕

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举办的第十届澳大利亚文学周活动于5月10日正式启动。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安思捷女士在10日的开幕式上表示:“今年是澳大利亚文学周十周年纪念,也是自文学周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我们很荣幸请到澳大利亚的文学巨匠们来参加这次的一系列活。同时,我们也要向那些把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专家们表示致意!”

作为出版大国,澳大利亚的很多作家和文学作品以前却很少为中国读者所知。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为了促进中澳文化交流,自2008年以来每年在中国举办澳大利亚文学周,旨在拉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和中国大众之间的距离,促进两国文学界、出版界之间的交流。十年来,文学周受到中国读者、媒体以及学界的欢迎,促进了中国文学界和老百姓对澳大利亚文学的了解,有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值此文学周十周年之际,四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澳大利亚作家来到中国。包括澳大利亚国宝级历史传记作家托马斯·基尼利。著名的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就是由基尼利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作为历史小说作家,他的代表作还有《澳大利亚简史》《澳大利亚人》等。

参加此次文学周活动的另一位澳大利亚文学界名人是以续写名著《小妇人》而获得2006年普利策文学奖的女作家杰拉尔丁·布鲁克斯。从战地记者到历史小说作家,布鲁克斯的小说《马奇》《奇迹之年》《书之人》等早已红透英语文学世界,这些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

另两位作家是儿童文学的专家。布朗温·班克洛夫特是一位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她的绘本作品以原住民特色的艺术形式把澳大利亚的小动物介绍给小朋友。在开幕式上,她的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绘本《下大雨了》正式发布。约翰·马斯登的《明日战争》系列是澳大利亚青少年的必读作品,并由知识出版社于2005年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由翻译家李尧翻译的三部澳大利亚文



托马斯·基尼利在第十届澳大利亚文学周开幕式上为读者签名

学作品:托马斯·基尼利的《内海的女人》、布朗温·班克洛夫特的《下大雨了》、亚历克斯·米勒的《煤河》,也在文学周开幕式上举行了首发仪式。

此次澳大利亚文学周活动是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四位作家10日到18日期间在北京、上海、苏州、哈尔滨、呼和浩特、西安、成都和广州举办了19场作家与读者见面活动。此外,四位作家还到北京大学等高校参与了大学生的讨论会。



以色列画家Menachem Helholz-Or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